

## 北京奧運 51 金： 中共實行「舉國體制」下的產物

時

評

Winning 51 Gold Medals at Beijing Olympics:  
An Production of CCP's "Whole-Nation System"

王正旭 (Wang, Cheng-Hsu)

致理技術學院助理教授

第 29 屆奧林匹克夏季運動會，於 8 月 24 日晚間在北京「鳥巢」體育場（國家體育場）隆重閉幕。這一場被國際奧會（I.O.C.）主席羅格（Jacques Rogge）喻為無與倫比（truly exceptional games，亦有人認為應翻譯成獨具特色），讓中國和世界彼此更能相互瞭解的體育盛會，對多數大陸人民而言，無疑將是令人陶醉且久久難以忘懷的記憶。尤其中國大陸運動員在本屆賽會裡，以奪取 51 面金牌的亮麗表現，史無前例地站上世界體育首強的位置，加上南韓 13 金（位列第 7）、日本 9 金（排名第 8）的成績，證明了亞洲國家體育實力已占有相當顯著的地位，也讓歐美傳統體育強國刮目相看，不敢輕視。

北京奧運會，內涵著中國人多年來的夢想，肩負著中國以「和平崛起」面貌走向世界的責任，最終搭配了 51 面金牌的戰績落幕，這般結果，想必中共當局和大陸人民應該是滿意的。事實上，為了得到這個滿意的結果，各界注入在軟硬體的投資金額，包括場館設施、城市建設等，粗估高達四百億美金，這在歷屆奧運會中也是「無與倫比」，在很大程度上可謂「用錢堆起來」的，至於人力資源的投入，則更難以計算。當然，相較於中國大陸總體經濟發展成果，籌辦北京奧運投注的四百億美金，所占份額並不大，何況其中許多是有形的資產與建設項目，會後可以繼續利用或變賣；至於各界關注中國經濟是否會產生「奧運低谷效應」的負面影響，目前看來也有限。惟中共當局為辦好這次奧運會，從 2001 年的申奧、過去 7 年對於以北京為主等 7 個承辦城市的建設、鳥巢

與水立方（國家游泳中心）等新穎場館的興建、聖火傳遞、安全與反恐維護、開閉幕式的壯闊場面、甚至大規模推展的政治文化和群眾運動（如創建文明城市、八榮八恥）等，倘言中國大陸是傾全國之力籌辦北京奧運會，並不為過。

特別值得一提者，從近幾屆夏季奧運紀錄觀察，主辦國能夠成為金牌榜首的，寥寥可數！主要原因在於，國際體壇綜合實力頂尖者，冷戰時期集中在美國、前蘇聯、東德等國家，90年代以後，則是由美國一枝獨秀，俄羅斯、中國大陸、澳大利亞等國緊追在後伺機竄起。而奧運主辦權按例在世界各大城市輪流的情形下，除了美國洛杉磯與亞特蘭大兩城市舉辦間隔僅12年（1984與1996）較特別，讓美國當了兩屆東道主與獎牌榜首外，另一次則為前蘇聯舉辦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，也曾享受過最多金牌的榮耀。不過，莫斯科和洛杉磯奧運會分別因為美、蘇兩陣營的相互抵制，使得參賽隊伍銳減而讓金牌成分褪色。因此，中國大陸能在北京奧運以主辦國身分一舉衝上金牌榜首，而且是在亞洲國家中首創（1964年東京奧運與1988年漢城奧運，日、韓兩國並未有此成就），殊屬不易。

然而，中國大陸運動員之所以能勇奪51面金牌傲視全球，除了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的主場優勢外，龐大的人才隊伍、嚴格的訓練環境、各界提供的優渥獎勵、以及運動員面對這百年一遇的難得機會而產生的奮勇心態等，也是重要因素。更全面的說法，還是中共持續實行多年的「舉國體制」型態，全力培養運動員奪牌，才能在本屆賽事中大放異彩。

舉國體制興起於舊蘇聯，尤其是冷戰時期、計畫經濟年代的共產主義陣營。由於國家綜合實力相對落後，為了利用體育競賽成績宣揚共產制度的優異，因此採用集中全國財力、物力、人力的途徑，組成一支龐大的體育訓練隊伍，以競技體育為主攻方向，力求爭取最佳的競賽成績；更明白地說，就是調動社會大量資源，訓練出金字塔頂端的運動選手。長期以來，這個模式在中國大陸持續沿襲，乃因中共一直賦予體育繁重的政治、統戰、外交任務，即使在改革開放後中共宣稱以公有制為主、多種成分所有制為輔，實際卻是市場經濟掛帥的氛圍裡，由於中國必須走向世界，而體育所具備的特殊性質，使其肩負的責任更形沈重。例如：藉由奧運會這種大型賽會的舉辦，塑造經濟成長與社會和諧的景象；利用民眾對體育的狂熱以及對明星運動員的崇拜（例如百十公

尺跨欄選手劉翔、籃球員姚明、國家乒乓球隊、跳水隊、體操隊等），塑造人民對國家民族的忠實信念，甚至對執政者的信服；至於外交（本次奧運總計邀請 80 多個國家、地區或國際組織，110 多位元首、政府首腦、王室代表、地區領導人和國際組織代表及配偶，為歷屆奧運之最）、統戰（以奧運聖火及名稱問題，與臺灣進行政治角力）等議題，則是體育的基本附屬工作，更無庸贅言。

而競技體育所強調的成績，在本屆奧運 51 面金牌，總獎牌 100 面（次於美國的 110 面）的結果下，對中共而言，更突出了舉國體制在總結成就背後所發揮的力量，例如，中共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即曾表示：「堅持舉國體制絕不動搖」；北京奧組委高級顧問、前中國奧委會主席魏紀中也堅稱：「金牌第一，說明舉國體制有效」。由於中共採取目的性、有計畫地培養競技體育選手，特別強調體型分級或個人技巧方面，因此中國大陸選手在本屆奧運傳統拿手項目，例如跳水、體操、乒乓球、羽球、舉重、射擊、柔道等依舊斬獲豐碩。至於射箭、彈簧床、輕艇、帆船、擊劍、拳擊、游泳等弱勢或冷門項目，卻也令人驚異地奪取多面金牌。究其因，除了必然的競爭汰換，派遣最優秀選手出擊，中共大手筆高薪聘請外籍教練，也是在西方國家傳統強項例如擊劍、拳擊、帆船、輕艇等脫穎而出的關鍵之一，質言之，沒有舉國體制作後盾，金（獎）牌總數必然大打折扣。事實上，以中國大陸人才之豐沛、國家投注專業體育訓練經費之多、運動選手一戰成名後的經濟利益和社會聲望的驅使慾念之高，尤其是國家機器以權威手法調動社會資源的壟斷能力之強，在在使得舉國體制和競賽成績的相互證成，變得理所當然。

即使有如此優異的成績，但是一波波懷疑、挑戰舉國體制的聲浪，也隨著金牌數的產出而快速累積。這包括了：

第一，奧運金牌數最多，顯示競技體育的成就，但這種菁英思維與訓練方式，無法凸顯全民體育、群眾體育的普及。因此，中國大陸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體育大國，尚存疑問。

第二，投注大量資源以奪取獎牌，這確實拜國家機器高度權威統治之賜，經費得以有目的地進行調度灌輸。然而，投入在運動菁英培養者多，在基礎體育教育和研究者少；以競賽成績為追逐目標，讓社會資源減少對民生經濟或基層教育的配置，孰輕孰重？看來中共選擇了前者！用個比喻來表示，即使以大

量資源造出了攻擊用的大砲，若無法妥善地維繫螺絲釘等零件的良率，或者因為缺少潤滑用的黃油，而使大砲停擺，那麼砲身終將陷入無用武之地。因此，是否應該揮別只追求奧運獎牌的菁英形式主義，轉而把重心放在對基礎的關注？

第三，有研究指出，目前中國大陸約有3千多所青少年體育學校，將近40萬青少年投入訓練；其練習的目的，健體強魄固然有之，但更多的恐還是覬覦功成名就後的經濟報酬，忽略了體育的原始精神。舉國體制下，中共以人海戰術、封閉式環境甄拔人才，雀屏中選者當然可以躋身保障之林，甚至一享魚躍龍門的待遇，但更多的中箭落馬者，幾乎都落得自我承擔的苦境。這種優勝劣汰的殘酷，對於有心投入體育事業的大陸青少年而言，是否公平？國家對於各階層運動選手，特別是無法脫穎而出，但也曾有優秀表現的選手，是否有妥適的照顧、輔導配套措施？

第四，為了在競爭激烈的舉國體制裡生存，導致若干體育決策官僚、教練、選手、家人，甚至摻雜現實功利的商業行為者，形成一個利益糾結的集團亂圈，以非常手段應對，或者對運動員施以超出體能負擔的訓練份量，或者以高額獎金利誘，或者在各項資格與報名指標上作弊造假。例如，目前已遭國際體操總會列為重點調查對象的中國女子體操隊，個別選手年齡可能涉嫌在奧運會中虛報造假，儘管還在調查階段而結果尚未出爐，但身為主辦國，發生這種事情，總是諷刺，而大陸境內類似這樣的事例，究竟還有多少而未被察覺揭發？

第五，雖然金牌數最多，但換算之後每面金牌價值不菲，各種統計結果，從幾千萬到幾億人民幣都有，這樣的投資報酬率真的划算？這是否把體育的基本精神予以異化？相較歐美體育先進國家，其金牌選手或來自業餘，或以「寄體育於生活」的態度從事運動，即使有身價高昂的職業運動員參賽奪金，但其收入係來自於高度發展的經濟結構與完善的俱樂部體系，並非如中國大陸一樣幾乎由政府介入，採長期、重點、享特殊津貼的訓練模式。在市場經濟思維占主位的今天，中共仍採舉國體制，是否有跟不上潮流的感覺？

綜上所述，大陸運動員在北京奧運場上揚名立萬，固然為中國的民族凝聚和國家士氣，營造難以量計的效果，在中國傳統講顏面、爭口氣的文化裡，透過舉國體制站上競技體育的巔峰，也讓許多大陸民眾為之癡迷瘋狂。不過，這

種讓體育精神異化的體制，在社會資源分配、基礎教育投資、國民體質提升等方面，並未發揮讓人民滿意的效果，卻也是不爭的事實。

奧運會的英雄出現了，這些英雄即將面對的市場身價逐漸清晰了，中共藉辦奧運展現實力的夢想更是徹底實踐了。然而就像開閉幕儀式時，北京夜空亮麗的煙火表演一樣，照亮的只是鳥巢以及其所在的北京城中軸線，一條象徵權威的中軸線；為了凸顯這場煙火的絢麗，北京城當時是黑暗的、被管制的，絕大多數北京居民只能站在黑暗和被管制的一隅，去享受短暫的視覺效果。就像舉國體制一樣，塑造的只是少數個人英雄，但作為執政者，中共更須關心的，卻是絕大多數為英雄歡呼的人，因為沒有這些人的配合與投入，英雄是沒有價值的。